

古代長江下淤

圩田志整理與研究

莊華峰自署



莊華峰◎編著

GUODAI CHANGJIANG XIAYOU
WEITIANZHI ZHENGLI YU YANJIU

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资助出版

古代長江下游

圩田志整理與研

華峰自署



莊華峰◎編著

GUDAI CHANGJIANG XIAYOU
WEITIANZHI ZHENGLI YU YANJIU

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521

責任編輯:胡志立

責任校對:韓 敏

裝幀設計:丁奕奕

責任印制:郭行洲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代長江下游圩田志整理與研究 /莊華峰編著. —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76-0885-6

I. ①古… II. ①莊… III. ①長江流域—圩田治理—研究—古代 IV. ①S277.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89721號

古代長江下游圩田志整理與研究

莊華峰 編著

出版發行: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蕪湖市九華南路189號安徽師範大學花津校區 郵政編碼:241002

網 址:<http://www.ahnupress.com/>

發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傳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蕪湖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規 格:787×1092 1/16

印 張:34

字 數:610千

書 號:ISBN 978-7-5676-0885-6

定 價:68.00元

凡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版圖書有缺漏頁、殘破等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前言

一、本書出版的緣由與意義

自唐代起，在長江下游的平原地區，通過築堤方式將地勢較低的窪地圍墾種植，習稱圩田（又稱圍田）。它廣泛分佈在蘇、皖兩省沿江一帶及太湖、巢湖、丹陽、水陽、青弋等湖河地區，是長江下游地區土地利用的重要形式。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史學存在着兩種並行不悖的傾向——細分的傾向和綜合的傾向。前者最明顯的表現是區域史、部門史和專題史研究的興起，不再籠統地以整個中國或整個經濟為研究對象。後者是指從經濟與社會、文化、自然的相互關聯中去研究經濟的發展，不再把經濟的因素孤立起來進行研究。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有關圩田問題的研究便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史的迅速發展以及一些交叉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為圩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並促使圩田研究向縱深發展。加強對長江下游圩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有利於豐富和深化該區域經濟史、水利史、社會史、災害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對於保證圩區『生態——經濟——社會』三維複合系統的健康運行與可持續發展，可以提供可靠的基礎理論依據與歷史借鑒，也可為其他相關學科提供可以憑信的歷史知識。因此，圩田研究將是充滿活力的前沿課題。

在圩田研究方興未艾的今天，有關圩田志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卻未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圩田研究的開展。因此，本書的出版不但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本書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現實意義。如《當邑官圩修防彙述》一書，目前僅國家

圖書館與安徽省當塗縣地方志辦公室有藏，版本彌足珍貴。它『薈萃史乘及明之冊籍、清乾隆史邑尊中心埂岸牘、咸豐間圩工條約、朱小宕圩圖說』，材料可謂翔實齊備，不僅對研究官圩個案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而且也為開展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圩田研究提供了豐贍的資料，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自明的。同時，本書的整理與出版，對各級政府進行水資源的科學規劃與利用，以及對圩田進行有效的管理均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圩田研究學術史回顧

有鑒於圩田研究的歷史作用與現實價值，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學界對於圩田的研究一直持續不斷，趙崔莉、劉新衛在《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圩田研究綜述》（《古今農業》2003年第3期）對此有詳細闡說。

我國學界對於圩田的研究開始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階段的研究相對薄弱，成果較少，僅有少量論文見諸報刊。這些論文主要集中於對圩田概念及其發展過程的描述，如寧可的《宋代的圩田》（《史學月刊》1958年第12期）對宋代圩田修築辦法、分佈情況、官圩私圩特點、圩田形成的原因與影響等問題作了初步研究。繆啟愉的《吳越錢氏在太湖地區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統》（《農史研究集刊》第二冊，科學出版社1960年）對圩田的起源和發展做了一定的梳理，對吳越時期的圩田結構、水利技術及管理制度的初步分析。吉敦諭的《何謂圩田：其分佈地區與生產情況怎樣？》（《歷史教學》1964年第8期）對圩田的概念、圩區的農業生產作了介紹。這是圩田研究的起步階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有關圩田的研究進一步受到學界的重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史的迅速發展以及一些交叉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為圩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並促使圩田研究向縱深發展。特別是近幾年來，社會變遷關係的研究勃然而興，人們從災害學、歷史氣候學、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綜合考察圩田的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變化。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這裏從專著、論文和課題立項三個方面予以回溯。

專著方面 這一時期出版的專題研究圩田的著作僅有兩部，較早問世的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繆啟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近期出版的則有趙崔莉著《清代皖江圩區社會經濟透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者以塘浦圩田為中心，就歷史資料所及，介紹了塘浦圩田的發生、發展及其演變情況，通過歷史概貌的分析，探討塘浦圩田開發的成敗得失。後者在介紹清代皖江流域圩區的圩田分佈、圩田類型和特點，並分析其組織特點的基礎上，集中探討了不同自然環境和社會狀態下圩區的應對問題，展示了其內部的組織管理及權力運作方式，從中透視出水利社會中國家、地方與社會的關係。

而涉及圩田研究的相關著作則有不少。如冀朝鼎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鄭肇經的《太湖水利技術史》（農業出版社，1987年），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寫的《太湖地區農業史稿》（農業出版社，1990年），張芳的《中國農田水利史》（農業出版社，1990年），彭雨新、張建民的《明清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韓茂莉的《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魏嵩山的《太湖流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肖華忠的《鄱陽湖流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萬繩南、莊華峰等的《中國長江流域開發史》（黃山書社，1997年），日本學者森田明的《明代水利社會史研究》（國立編譯館出版，1997年）與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研的《19世紀中期中國雙重統治格局的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蔣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馮賢亮的《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都辟有專章或專節論述圩田問題。

論文方面 有關圩田研究的論文涉及面較為廣泛，研究的內容也較為豐富，涉及圩田的起源、圩田的區域分佈、分類、發展特點、修築管理、作用評價等諸多方面。多數學者認為，圩田由長江下游地區向中游地區擴展，依次為太湖地區、江淮地區和漢江流域。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圩田開發方式與農業生產研究。圩田開發方式在傳統農業生產中佔有重要地位，相關研究不乏其人。圩田的開發與社會條件分不開。首先，圩田的開發與人口因素密切相關。許多學者認為人口過度膨脹給農業帶來巨大壓力。為了解決這一壓力，農民勢必要開墾

新的耕地。張建民《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1987年第2期），認為清代人口增長的壓力，成為推動江漢——洞庭湖區圍墾築垸的強大動力。張建民《江蘇、安徽沿江平原圩田水利研究》（《古今農業》1993年第3期）對江蘇、安徽沿江平原圩田從宋代到清代的變遷情況，以及圩區農業生產情況作了論述。同時，圍圩墾荒是一項艱苦勞動，人口的不斷增長提供了必要勞力，這在圩田開墾的初期是相當重要的。閻國年、陳鐘明、錢亞東、王紅《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地關係的歷史淵源與協調發展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等認為，太湖地區完備的塘浦圩田制度與人口和耕地的比例協調分不開。因為充裕的勞力，既能完成塘浦圩田的修築，又使人均耕地較為富餘，既做到地盡其用，又無須亂墾亂圍。

人口的大量流動即移民潮的發生對圩田的發展有重要作用。張國雄《中國歷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從中國歷史上人口大規模遷徙的角度考察了圩田的發展，認為唐宋時期大批北方移民的遷入，促使了以太湖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崛起，明清時期「江西填湖廣」移民潮的到來，解決了江漢——洞庭湖平原以前人口較少、勞力缺乏的困難，並構成其產生「湖廣熟，天下足」的重要內因。

除了人口因素以外，圩田的開發還受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許懷林《明清時期鄱陽湖區的圩堤圍墾》（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下冊，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850頁—861頁）認為明清時期，政府對鄱陽湖區征派巨額的稅糧，促使湖區擴大圍墾以增加耕地面積；此外，航運商業的繁榮，也激發了人們開墾圩田的熱情，以便使更多糧食進入流通領域。巴兆祥從圩田的發展脈絡、區域分佈特徵、類型，以及在圩田維護方面的成就與經驗等方面對江淮地區圩田的開發狀況作了探討（《江淮地區圩田的興築與維護》，《中國農史》1997年第3期）。王建革在研究圩田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與土壤的環境關係時，應用大量土壤地理學知識，具體分析了圩區土壤的形成、演變、分類和分佈情況（《技術與圩田土壤環境史：以嘉湖平原為中心》，《中國農史》2006年第1期）。

有的學者則結合具體圩田做個案分析，如周生春以宣城的百丈圩作為研究對象，具體考察了該圩興修的創議者、工程的主持人、修築的時間、圩堤潰決的具體原因，以及最終被廢棄的緣由等問題，並對諸多問題做了一番考訂正訛工作（《論百丈圩的興廢》，《浙江大學學

報》1992年第1期)。趙崔莉《晚清當塗官圩衰落探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8年2期)以晚清當塗大官圩為個案，考察了大官圩逐漸衰落的表現，如水災頻仍、頻繁修改圩規、圩區鄉董無力舉賑；並從自然環境、人地關係、圩區管理、世風民情、社會形勢以及戰亂等方面多角度探求其衰落原因。莊華峰則從大公圩的開發及其特點、大公圩的管理及其效應，以及大公圩開發所引發的環境問題諸方面，對清代安徽當塗大公圩作了深入考察(《清代圩田的開發與環境問題——基於當塗大公圩的考察》，《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各個時期圩田開發的特點也引起人們的關注。其中崔思棟《江淮地區圩田初探》(《安徽史學》1984年第6期)認為，江淮地區到了宋代大量修建圩田並日趨完善，達到了全盛時代，並具有規模大、結構合理、修築技術也相當完善等特點。魯西奇《歷史時期漢江流域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演變》(《中國農史》1999年第1期)認為，元代的江漢平原，因勞動力匱乏，經濟處於曲折緩慢發展過程中，但垸田的興起，開啟了江漢平原全面開發的歷史進程。日本學者濱島敦俊《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明代中期江南地主的投資活動》(《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1989年)認為，明代江南地區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前，主要開墾圩田或圍田以擴大農田面積，屬於外延式開發；此後，則採用分圩和幹田化的方式進行農田的改良，屬於內涵式開發。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與耕地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之一》(《中國農史》1997年第3期)認為，「幹田化」的方法，除了疏通河道排水外，就是將一個大圩分為眾多小圩，即「分圩」。汪家倫《明清長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術》(《中國農史》1991年第2期)認為，太湖地區的塘浦渠系歷明清朝屢經治理，基本上保存下來。江淮地區的圩田到了明清時期進入了極盛時期，新築的圩田數以百計，其中千畝以上的大圩有五、六十座。劉純志、宋平安《清代江漢地區垸田經濟簡論》(《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認為，江漢平原的垸田隨着贛、皖移民的大量進入，在明清時期進入大開發的全盛時代。到了清代，江漢平原經濟開發出現兩個顯著特徵，即私垸大量出現和洲灘地日益被開墾。這時的圍墾很盲目，加速了水患的發生，從而抑制了江漢平原經濟發展的速度。江漢經濟就是在這種前進中有倒退、倒退後重新組合中螺旋式發展。總之，明清時期宜農土地墾殖已趨於基本飽和，在巨大人口壓力以及急切的生存壓力驅動下，與水爭田、墾山為地不可避免帶有強爭性，這一時期的圍墾帶有明顯盲目性的特點。

2、圩田過度開墾與生態環境研究。圩田開發是長江下游人民在農業生產及水利建設方面的一個創舉，它在解決江南人多地少的矛盾

盾，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也因過度圍墾而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首先，圩田過多開墾造成湖面縮小、水旱災害加劇，導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進而引起嚴重的生態失控。近年來，不少學者對於這一問題給予了較多關注。林承坤指出，古代江漢平原採用築堤圍垸的開墾方式，致使地表起伏增大，河床淤高，沿岸河灘等受到淤積，從而使洩洪和調節徑流能力降低，破壞了地理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而江南三角洲塘浦圩田的開墾方式，則不改變地表起伏，水系、湖泊都能得以長期保存，因而歷史上洪、澇、旱等災害顯著減少（《古代長江中下游平原築堤圍垸與塘浦圩田對地理環境的影響》，《環境科學學報》1984年第2期）。莊華峰《江南圩田：一個古老而彌新的話題》（《光明日報》2003年6月3日）、《安徽古代沿江地區圩田開發與生態環境變遷》（《安徽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長江下游圩田開發與環境問題》（《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及《古代江南地區圩田開發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叢》2005年第3期）諸文具體探討了圩田開發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認為因過渡圍墾破壞了江南地區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環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嚴重局面，從而給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災的壓力；歷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間的協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災年年有之；大量構築圩田，使湖泊面積大為縮小，影響其調節水量的功能，破壞了本地區的生態條件，致使災害頻頻發生。同時，作者還對圩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了理性思考。朱誠等《長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周圍地區2000年來水災研究》（《自然災害學報》2001年第4期）認為，元、明、清各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盲目圍墾，使河港淤淺，水系紊亂，一遇洪水則宣洩困難，常滯流於太湖的湖蕩河網區，水患自然愈演愈烈。劉沛林《歷史上人類活動對長江流域水災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認為明清時期洞庭湖一帶築堤圍墾過多，嚴重影響江湖蓄泄關係，湘鄂兩省水災不斷。汪潤元、勾利軍《清代長江流域人口運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年第4期）認為，清代長江流域的農民移墾山林和圍湖造田，帶來了空前的生態破壞。總之，明清兩代的圍湖造田、盜湖為田變本加厲，使得河湖水的面積萎縮，導致對圩田調蓄功能的破壞和灌溉效益的喪失，以及對航運、水產以至於氣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二，圩田的過度開墾造成農業的減產，從而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圩田的過度開墾使河湖水面積的萎縮，使得漁業受損。尹玲玲《明清時期湖北地區的漁業經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2期）指出，明中葉以後，湖北地區因圍湖建圩嚴重，河流湖泊逐

漸淤淺、淤廢，致使漁利有所下降，漁業漸趨衰落。清代以後，圍湖建圩更加嚴重，河湖漁利進一步迅速減少，漁業經濟日漸萎縮。圩田水旱災害的加劇帶來農業的減產。宋平安《清代江漢平原水旱災害與經濟開發探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認為，清前期以前江漢平原的發展比較繁榮，但在清中後期由於水災頻繁，江漢平原的圩田農業嚴重受損，糧食生產明顯滯後於洞庭湖平原。而農業的減產必然會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張建民《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1987年第2期）指出，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的洪澇災害頻繁，引起修防負擔加重，導致了錢糧的免征以及巨大的賑災費用，給國家財政收支造成了巨大影響。

3. 圩區基層社會組織與社會管理研究。關於圩田的體系，有的學者借助社會學進行研究。陳阿江《水域污染的社會學解釋——東村個案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即從社會學角度，通過個案研究認為圩田體系是由田、地、水域構成的地理環境，以及生活在這一環境中的人和其他生物構成的生態系統。即包括旱地、水田、圩岸以外的河流或湖泊以及村民。指出，圩區就是圩圩相接與河渠結合的完整系統，即圩連圩，圩套圩的大片區域。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明清時期圩田的研究上。吳滔《明清江南地區的『鄉圩』》（《中國農史》1995年第3期）認為，由於圩田水利的重要地位，明清時期，各種行政干預手段和自發性民間團體介入圩岸的修築和管理，並與塘長制、圩長制相配合，結成一種以圩田網絡為基本紐帶的農村社會組織。文章通過考察明清兩代『鄉圩』組織體系的變遷，論述了圩田水利組織在維繫江南地區鄉村基層社會構成方面發揮的作用。日本學者濱島敦俊則通過對圩區『連圩結甲』等關係的分析，探討了圩與村落等基層社會組織的聯繫與區別（《關於江南『圩』的若干考察》，《歷史地理》第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趙崔莉的《清代皖江圩區的組織功能與社會控制》（《農業考古》2008年第3期）認為清代皖江圩區具有水利組織和基層組織的社會功能，並主要通過宗族對圩區進行社會控制。

圩區的管理主要包括政府和民間兩個方面。圩田水利的管理構成圩區管理的重要方面。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中，政府在水利事業中的組織作用和管理機能至為關鍵。田靜茹《試論唐代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武漢交通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指出，唐政府職能的發揮對長江下游地區農田水利的發展變化有重要作用。它表現在從中央到地方設置一套管理修建水

利的行政機構，由地方政府負責主持農田水利的興建維修；制定水利管理法令和法規，如指令全國水利的《水部式》和地方法規《錢塘湖石記》，對灌溉用水和一些與水利有關的其他事務作出具體的規定。虞雲國《略論宋代太湖流域的農業經濟》（《中國農史》2002年第1期）認為，宋代政府給予太湖流域水利建設以積極的財力和物力支持，並把興修水利納入地方官的常規公務；規定興修圩田、河渠、堤堰、陂塘之類水利的諸多內容不僅作為州縣長吏的重要職責，還直接與考課磨勘優劣相聯繫。莊華峰就唐宋時期政府對圩田的管理問題作了專題探討，指出唐宋時期尤其是在宋代，長江下游地區圩田開發在以往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發展，從而使這一地區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基地。圩田的快速發展，除了因為該地區擁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外，與政府有效的管理密不可分。政府對圩田的管理主要包括創設圩田管理制度、組織圩田生產，以及修築堤岸、生物養護、設置堰閘、開浚港浦等內容。由於政府的有效管理，使圩田產生了多元化的效應（《唐宋時期政府對圩田的管理及其效應——以長江下游圩田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9年第6期）。同時，莊華峰指出，政府在圩官選拔和任用方面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注意選拔廉潔之人從事圩務管理，二是建立對圩官的監督機制。這些富有特色的做法，是有效保障官圩（即大公圩）正常有序運轉的重要原因（《皖江流域圩田的興築與管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3年第6期）。

民間對圩區的管理主要表現在圩長制的創設上。圩長擔負着重要的職能，成了圩區重要的管理人員。圩長在有些地方被稱作塘長，也稱田甲、圩甲。圩長多由田地多的大戶擔當，其階級屬性是地主、富農，擔負着維持全圩勞動的組織和管理的責任。林金樹《明代江南塘長述論》（《社會科學戰綫》1986年第2期）具體考察了明代江南塘長的設立和職責，指出塘長的設立除更好地組織當地人力、物力，整治水患，開塘築岸外，還兼管錢糧、賦役等雜事。日本學者川勝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發展》（《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認為，萬曆初年江南水利修築的特點是重視塘長與圩長的作用，提倡利用當地的權利關係。日本學者濱島敦俊《明代江南之圩田水利與地主佃農》（《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指出，除了圩長、塘長之外，明代前期江南地區，糧長、里長、老人等也對圩區實施管理職能，並對修築圩岸，疏浚塘浦負主要責任。

4. 圩田開發與水事糾紛研究。所謂水事糾紛是指在水事活動中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爭執甚至暴力衝突事件，這是圩區的主要社會矛盾之一。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寧可《宋代的圩田》（《史學月刊》1958年第12期）指出，豪強形勢之家強佔民

田，或縱容奴僕惡佃欺凌人民，引起不少紛爭和詞訟，因而激化了階級矛盾。熊元斌在分析清代浙江地區水事糾紛時，將水利糾紛分成地區之間、村落之間、宗姓間、土客之間、農民與勢豪地主之間、農民與商人間等各種利益群體的矛盾與衝突（《清代浙江地區水利糾紛及其解決的辦法》，《中國農史》1988年第3期）。張崇旺從水事糾紛產生的主體着眼，指出明清江淮地區水事糾紛有個人和個人、個人和集體、集體和集體、行政區之間、上下游之間、國家和地方之間等類型。同時指出，在注重「人治」和私人土地佔有制盛行的傳統社會，江淮的水事糾紛往往不能得到及時預防和正確處理，因而引起了嚴重的後果：一是造成嚴重的人助天災，二是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三是造成地方社會的動盪和不安（《光明日報》2006年4月11日）。莊華峰則將宋代長江下游圩區各利益主體之間的水事糾紛作為研究重點，他在分析這一地區水事糾紛產生的原因及其糾紛類型的同時，着重探討了水事糾紛下兩宋政府所採取的積極的對策。這些對策主要包括構建圩區基層組織、修復水利設施改善用水環境、建立水則石碑等相關預警設施、制定水事法律法規、注意圩址勘察等（《宋代長江下游圩區水事糾紛與政府對策》，《光明日報》2007年1月12日）；《宋代長江下游圩田開發與水事糾紛》，《中國農史》2007年第3期）。

5. 圩區社會風尚研究。圩區民俗研究受到部分學者的重視，並取得一定的成就。趙崔莉《清代皖江圩區的民間信仰》（《古今農業》2007年第1期）指出，在清代皖江流域的圩區中，圩民們擁有相似的民風民俗和宗教信仰。皖江圩區宗教信仰形式多樣，普遍建有寺廟庵堂，並有舉行家祭的傳統。作者認為皖江圩區的祭祀活動既具有共性，也凸顯出本圩區的特點：一是對保護圩區農業生產安全的神靈特別崇拜，體現出重農的崇拜觀念；二是許多對圩區做出卓越貢獻的官紳成為圩民祭祀的神靈。這些神靈都是保佑圩區風調雨順、為農業、漁業消災避難的庇護之神。通過這些祭祀活動，圩民之間的凝聚力得到強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來的圩田研究中，研究方法日趨多樣化。我們知道，圩田問題是一個涉及土地利用、水利開發與糾紛、生態環境變化、人地關係互動、鄉村社會等內容的多學科交叉的課題。因此，一些學者除採用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之外，也注意運用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新的角度對圩田的相關問題作深入的探索。如王心源、陸應誠、莊華峰等在分析圩田的時空特徵時，主要運用陸地衛星影像與地理資訊技術，並結合歷史地理學對皖東南及鄰域圩田的時空特徵進行研究，得出結論（《基於遙感技術的圩田時空特徵分析》，《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6年第1期）。趙崔莉、劉新衛《清代無為江堤的屢次內遷與長江流域人地關係考察》（《古今農業》2004年第4

期)在考察明清無為州江堤不斷出現江逼堤退原因時,即從人地關係的視角,並借鑒地理學河流系統論原理,綜合考察了長江流域人口、資源、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指出清朝長江流域人地關係失調和自然環境惡化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另外,考古學、環境學、災害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正在不斷被運用到圩田研究上。

課題立項方面 近年來,在學界加強圩田開發與生態環境變遷問題研究的同時,相關研究課題也不斷獲准立項。如近年來莊華峰就主持有多項相關課題:安徽省跨世紀學科帶頭人科學研究資助項目『歷史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圩田開發與水患防治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19世紀長江下游圩田開發與生態環境變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19世紀長江下游圩田志要籍輯校』等。由於課題的立項,給研究工作注入了活力,因而有關圩田研究的成果也不斷湧現。

綜上所述,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圩田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取得了不少成績。但這一研究也存在着明顯的不足,主要有以下數端:第一,就整個圩田史的研究而言,對唐宋圩田的研究尚屬薄弱環節。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遠不如明清時期,表現出研究時段的不平衡性。第二,已有的唐宋圩田研究多流於宏觀問題的探討,多集中於圩田的開發、整治諸問題,從而出現了圩田研究或不夠具體、或研究多有重複等不足之處。研究不夠具體之處如圩堤修繕經費的籌集、宗族勢力對圩區水利的控制以及對圩區社會的影響、圩區兩熟制的推行(稻作兩熟制、稻麥兩熟制)等問題尚無人問津;重複性研究較多反映在論述圩田、災害、經濟等關係時,常陷入『圩田的過度開發——水旱災害加劇——農業經濟倒退』的迴圈之中。這種結論的推導過程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這無助於推進史學研究。第三,研究的空白處或研究有待於加强的地方尚有許多。如圩區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問題,生態環境變化與社會自控問題,圩田的經營與管理模式問題,圩田糧食產量的估算問題,圩區民眾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問題,以及政府與民間在圩田問題上的衝突及影響、圩民的生活狀況等問題,均有待於進一步探討。又如圩田作為一個水利共同體,形成獨立的水利社會。對於不同地方的圩田水利,僅考察其形成和演變是不夠的;在社會職能上,圩田作為重要的基層組織的鏈結點,它在人們的生活和生產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以及與經濟發展、政治格局、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等還有待於細緻考察。第四,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總的看來仍需進一步加強。如遙感技術在反映空間分異、揭示區域發展過程方面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獨特

作用，其宏觀、準確以及定量與經濟性等，在土地利用研究方面有着巨大優勢。但在以往的圩田研究中，這一研究手段運用的很少。有鑒於此，我們認為有必要轉換研究視角，採用新的研究方法，從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新的視野對古代圩田的耕作制度、管理模式、經濟地位、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生態環境變化與社會自控等學界鮮有論及的問題作出更全面、深入、準確、客觀的分析和論證。

三、本書的主要內容與編纂體例

本書所整理的典籍包括《萬春圩圖記》、《築圍說》、《築圩圖說》、《當邑官圩修防彙述》等四部專門記述長江下游地區圩田開發與管理、圩區生態環境變遷以及圩區社會生活方面的著述。

《萬春圩圖記》由北宋沈括撰寫。書中詳細介紹了萬春圩修復的緣由、過程及其經濟效益。該文最早收在南宋初年高布於括蒼（今浙江麗水）刊刻的《吳興三沈集》中的沈括《長興集》卷二十一，這個宋刻本在流傳過程中散佚嚴重，到明人翻宋刻本時，全部文集改編八卷，題稱《沈氏三先生集》，原來四十一卷本的《長興集》只剩下十九卷，編為兩卷。我們現在見到的《四部叢刊》三編中的《沈氏三先生集》，就是根據這個底本影印的。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書局刊刻過一本《沈氏三先生集》，這是清初吳允嘉重新輯補編完的本子。書名雖沿用明刻本之舊，而內容和編次却大不相同。其中《長興集》卷一至三為『原闕今補』，卷四至十二『原闕』，卷十三至三十『存』，卷三十一『原闕』，卷三十二『存』，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原闕』。吳氏想復宋本卷帙之舊，但實際上已不可能。吳氏所輯卷一為『騷賦、歌詩』，卷二為『序』，卷三為『議、論』。另外卷十三《宜州謝上表》一篇，原本有目無文，今從《宣志》補入，卷三十之末增收《自志》一篇，算是一種比較完備的本子。但是吳氏重編《長興集》時，並沒有見到明刻本，它是根據傳抄本重編的。吳編《長興集》中《萬春圩圖記》，與明刻本有兩處關鍵之處不同：一是吳編本『使宣州甯國縣令沈括圖視其狀』，明刻本作『使宣州甯國縣令沈披圖視其狀』；二是吳編本『括還，以謂前之以為不可興者，說皆可講也』，明刻本作『披還，以謂前之以為不可興者，說皆可講也』。其他如吳編本『轉運使武陵張顥』，明刻本作『轉運使武陵張顥』，純系吳氏所據底本謬誤，而《宋史》中只有張顥而無『張顥』其人（參見凌紹虞劉尚恒：《萬春圩研究中的史實考訂》，《蕪湖

縣文史資料》第四輯）。沈括所撰《萬春圩圖記》再現了勞動人民興修圩田水利以及與自然鬥爭的生動過程，成為我國記載修圩建堤的最早歷史文獻，在水利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文中所論述的一些富於創見的治水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鑒作用。

《築圍說》由明末清初學者陳瑚撰寫。陳瑚，江蘇太倉人，與同里陸世儀、江士韶、盛敬齊名，被合稱為「太倉四先生」。崇禎十六年（1643年）舉人，其父遂于經學，家教有法。陳瑚少時與陸世儀等過從甚多，論學辯駁，貫通五經，務為實學。時值婁江堰塞，江南大饑，陳瑚上救荒書，所言皆精切而可施行，但不被重視。明朝滅亡，他絕意仕進，避地昆山蔚村。蔚村一帶地勢低窪，「三四年來，歷遭水患，顆粒不收」（見《築圍說》），陳瑚便組織鄉人築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即古時一種更休迭戰的陣法，也稱迭陣法），不日乃成。他根據當地群眾的治水經驗和自己的親身實踐，撰成《築圍說》一書。尤為強調構築圩岸的重要性，指出「善治水者，必先治田。善治田者，必先治岸。村岸無修築之期，則村田無成熟之望也」（見《築圍說》）。圩岸即圩堤，又名正岸，對於低窪之地圩岸極為重要。正如農諺所云：「種田先做岸」。低田水患，以圩岸為存亡。因此，陳瑚強調圩岸的重要性是十分有道理的。書中陳瑚對圩岸的分段、規格及施工要求等都作了論述，對圩田的治理也多有論及，特別強調管理的重要性，指出「田圩既大，工役既眾，非擇人統理則散而無紀，須於村中公推一二公直勤慎者總管其事」（見《築圍說》）。陳瑚的《築圍說》雖然是總結特定地區的築圩經驗的，但對於圩區的治理，卻具有普遍的參考意義。

《築圩圖說》由清人孫峻于嘉慶十八年（1813年）撰寫。該書主要論述了太湖流域青浦地區治理「仰孟圩」的技術經驗和流弊。青浦低窪地區有眾多的「仰孟圩」。這類圩田四周高、中央低，最大的問題在於圩內排水困難，特別是處於圩心的「鍋底田」高水下壓，漬澇威脅更大。孫峻家住重固孫家圩，生於世代農家，他傾力修築本村圩岸，逐漸摸索出一套修築圩堤塘岸防禦水災的經驗，使水澇之年，莊稼不受其害。嘉慶九年（1804年），本縣遭受水災，低田大多被淹，顆粒無收，農民餓死者無數，孫峻悲痛至極，遂根據自己修築圩岸的經驗，寫成《築圩圖說》一書。該書內容有三：一為圩田結構圖及其說明；二為討論圩內的規劃佈局和工程設施；三為論述歷來圩田修築的弊端。書中所論不乏真知灼見，如關於圩內規劃佈局和工程設施，孫峻主張按照地勢高低差別，將圩內農田分為「上塍田」、「中塍田」和「下塍田」三級，分級修築界岸，實現「高低分治」和「梯級控制」；每級圩田內分區分格修築小塍岸，使「高低圍截」的大綱與「大小分搶」的細目互相配合，達到排灌自如，水不亂行的要求；在高差較大之處的「圍岸」、「搶岸」，修築畔岸（即戢堤），強固堤身，以截高塍暗隙滲水；對於

分級分區排水問題，針對四周高、中間低的大圩，孫峻進一步提出一套分級控制措施，具體辦法是，三級農田各級分築戽岸，使各級農田自成獨立區域，高低分開，梯級控制；將高程不同的農田分區，各區向外有溝渠與外河相連，置閘控制，從而使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各行其道互不干擾，嘉慶時青浦縣曾經根據這一原則整理過圩區管道，低窪荒區因為有了排水溝渠而得以耕種。《築圩圖說》一書語言通俗，切合水鄉實際，為當時農家所需。其行世不久就首先在孫峻的家鄉孫家圩「下區荒塍」推行，結果收到顯著的效益。時人王有光在《築圩圖說跋》中如是說：「始則免其賠荒，繼而漸臻成熟，得豐收焉。」於是，由鄉及區，由近到遠，逐步推廣，到嘉慶十九年（1814年）推行到青浦全縣。同治八年（1869年），知縣陳其元看到此書後指出，（該書）「議論明確，籌畫盡善。其堤也，則築塘、築圍、築搶之井井有條；其救也，則撤上、拔中、瀉下之在在有法。利害有論，形勢有圖，……洵屬閱歷有得之言」，認為「凡屬吳越低下之區，無不可以之為法，其利賴又豈止嘉惠一邑已哉」（參見《重刻築圩圖說》序），乃捐俸刻板印行，分發各州縣。

《當邑官圩修防彙述》一書刊刻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作者朱萬滋，安徽當塗人，家境殷富，自幼聰穎好學，為清朝秀才。鑒於當塗自南宋以迄元明，沒有一部全面記述大公圩（即官圩）圩務的志書，而已有的一些零星記述，又往往附于其他史志雜說，不利於治圩務者「事前事、考成規」，總結治圩經驗。於是，朱萬滋便着手彙集所能見到的歷代圩務史料，遠徵史帙，近據志乘，「稽其疆裏，綜其田賦，評其人物、土宜，溯興廢之由，驗得失之故」，上自漢唐，下迄光緒年間，理其散漫，薈萃成書。全書「或依年序列，或因事匯從，或推本窮源，或陳利指弊。篇首綴以序言，繼列事實、管窺蠡測」。是書分為6編30卷，所輯內容涵蓋了當塗邑180里之堤防，29圩之疆界的大概情況，編者試圖從歷史變遷過程中，說明圩田的遞變之跡，以供後世治圩務者參考借鑒。第一編《初編》分「建置」、「冊籍」、「檄文」、「條陳」4卷，考察舊制，取「食德服疇」之義。第二編《續編》為圖說5卷，列為「分圩列岸圖」、「工段標號圖」、「陡門涵洞圖」、「鎮市村落圖」、「修造潰缺圖」，有圖有說，圖文並茂，向人們展示了圩區水利社會的生動立體畫面。第三編《瑣言》凡6卷，輯錄有關圩區「修築」、「保護」、「搶險」、「夫役」、「董首」、「胥吏」諸方面的言論。第四編《庶議》凡9卷，主要收錄庶人關於圩區醫俗、選能、均役、興厘、宣防等事務的「巷議」、「曲議」、「末議」、「諷議」等內容。第五編《述餘》8卷，備載當塗邑「山水」、「人物」、「土宜」、「名勝」、「政績」、「藝文」、「器具」、「占驗」等，述其人傑地靈、物產豐美，博引繁稱，考核精詳。第六編《述餘外補編》2卷，補收大公圩周邊如福定圩、柘林圩、洪潭圩等十多個小圩的開發與管

理情況，單獨成卷，猶如經部有別義，子部有外編也。編者在介紹每個小圩之後，還將其一一繪成圖幅，輔以圖說，以彰顯其對大公圩的環境拱護衛作用。本卷最後還收錄『集說』、『常歌』、『可慮』諸務，方便『博雅之士，便於考古；功名之士，樂於救時』。可見，《當邑官圩修防彙述》一書資料十分豐富，它詳細記載了大公圩的建圩歷程、內外部地理環境、耕作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生態環境變遷等情況，為我們深入考察大公圩的開發與變遷情況，進而瞭解長江下游圩區水利社會的風貌，提供了大量且最為可靠的文獻資料。

本書所輯四部（篇）圩田志資料，上起北宋，下至清代，依據其成書年代進行編排。為了給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研究資料，本次整理、編纂時保留了各圩田志原有的風貌。本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凡對現今已無參考價值的條文，我們均作了刪節。如《當邑官圩修防彙述》一書中重複的內容作了刪除等。刪節後，遇有文字不連貫處，則酌情作了處理。需要說明的是，論及長江下游圩田開發的著述尚有不少，如史鑒議《東南水利事宜》中介紹了圩岸的修築方法，金藻《三江水學》中論及了圩田水利，還有周忱、呂光洵、何宜、吳詔、朱袞等人，都論述過圩田水利（參見《農政全書》、《吳江水考增輯》、《吳中水利全書》等），但這些著作都是兼帶述及圩田水利的，其針對性不夠強，加之篇幅所限，就沒有將其收入本書了。為了使讀者對圩田研究情況有個大致瞭解，我們對學界近年來的圩田研究狀況作了簡要回顧，書末則附了編者近年來圩田研究的主要成果。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和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學術著作出版基金的資助，馬鞍山市地方志辦公室為方志查閱提供了方便，安徽師範大學圖書館周向華研究館員、董家魁博士和法學院許光大等同志為本書編纂提供了諸多幫助，我的研究生何靖宇君、徐達標君、黃劔敏君等也參與了資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我們水準有限，書中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2013年11月于天津花園